

主編 王雲五

人人文庫



中國的文藝復興

顧一樵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顧一樵著

中國的文藝復興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國的文藝復興目錄

卷上 中國的文藝復興

- 一 文學革命與文藝復興……………一
 - 二 文化根源與創造活力……………一〇
 - 三 文化交流與時代精神……………二〇
 - 四 舊文藝的新認識……………二九
 - 五 新文藝與新時代……………三九
 - 六 文藝復興與教育改造……………五三
- ## 卷下 世界教育的改造
- 一 教育與人生……………六一

二	知識與智慧·····	六九
三	自由與平等·····	八一
四	創造與領會·····	九四
五	博愛與大同·····	一〇七
六	原子能時代的世界觀·····	一二八

中國的文藝復興

卷上 中國的文藝復興

一 文學革命與文藝復興

中國的文藝復興，是目前迫切需要的一個運動。我以為民族復興運動包括三大要素：政治革命，社會改造和文藝復興。這三個運動同樣重要，缺一不可。歐洲的民族復興運動，從文藝復興(Renaissance)開始，經宗教改革(Reformation)而完成政治革命(Revolution)。印度的民族復興運動泰戈爾主張照歐洲的先例，從文藝復興開始，以喚醒印度民族的靈魂。甘地主張從政治革命開始，以求印度的獨立。泰戈爾晚年因為還沒有看見印度的獨立，深以甘地的主張為然。甘地又認為政治革命與社會改造宗教改革同樣重要。中國的民族復興運動，自孫中山先生倡導革命以來，早就從政治革命開始，改變了歐洲的先例。孫中山先生的認識與領導是正確的。這五十年來，經過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對日抗戰三個重要階段，民族的

獨立自主已經由奮鬥得來，一百年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亦已解除。社會改造，即是照中山先生民國元年早已提倡的社會革命，我們還在期待着。新生活運動，平民教育運動，鄉村建設運動，經濟建設運動，都說明了社會改造運動的需要，這個運動應當包括兩大部份：經濟改造與教育普及。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雖產生在政治革命運動以後，却發端在社會改造運動以前。上面說過，三個運動同樣重要，缺一不可。所以照發展的順序說，我們先從政治革命開始，經文藝復興而達到社會改造。目前經濟無辦法，教育不普及，形成了社會的不安定少進步。這種現象在抗戰後期已經明顯，復員以來，有變本加厲之勢。所以，有些人開始覺悟：民族復興的工作需要重新發動這三大運動。社會改造運動發動最晚，成績最差，尤須「迎頭趕上」。政治革命固然有「革命尚未成功」的遺訓，文藝復興難道就已經成功了嗎？倘若已經成功了，我們必會開出無數燦爛的文藝之花，而這些燦爛的文藝，亦一定會賜給社會不少的光明和安慰。倘若還有待於大家的努力，我們便不得不根據三十年來的經歷與認識，先做一番坦白的檢討，再直率的貢獻一點具體的見解，請求文藝界學術界的朋友批評和指教。

抗戰時期，李長之先生印了一本集子，書名迎中國的文藝復興。我們顧名思義，可以知

道中國的文藝復興，像中國的其他革命工作一樣，還有待於大家的努力。有些人以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代表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外國朋友也有這樣想，這樣說的。還有不少朋友，而且更多的是青年朋友，不肯輕易自滿的承認：中國文藝復興運動已經成功了。有些人可以承認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開始，雖然也有人願意把現代文學革新運動追溯辛亥革命的前夕。錢玄同致陳獨秀書中曾說：『梁任公先生實爲近來創造新文學之一人。雖其政論諸作，因時變遷，不能得國人全體之贊同，即其文章，亦能盡脫帖括蹊徑，然輸入日本文之句法，以新名詞及俗語入文，視戲曲小說與論記之文平等，此皆其識力過人處。鄙意論現代文學之革新，必數及梁先生。』李長之在五四運動之文化的意義及其評價一文中說：『五四所象徵的時代精神是甚麼呢？有人說是文藝復興，我看並不是。這個時代還不夠文藝復興。……假若要用一個名稱以確切說明五四精神的話，我覺得應該用啓蒙運動。……啓蒙運動的主要特徵，是理智的，實用的，破壞的，清淺的。我們試看五四時代的精神，像陳獨秀對於傳統的文化之開火，像胡適主張要問一個「爲什麼」的新生活，像顧頡剛對於古典的懷疑，像魯迅在經書中所看到的吃人禮教（狂人日記），這都是啓蒙的彩色。』

在陳衡哲女士編輯的英文中國文化論文集中，胡適之先生在宗教與哲學章中說到佛教輸入以後中國學術思想的奮鬥與成功，可以比作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造。他以宋儒的建立新孔學比擬歐洲人文主義派的重新發現希臘與羅馬。集中「文學革命」章亦是由胡先生執筆，英文原題爲 *The Literary Renaissance*（譯意是文學的文藝復興）。文中首先引了民國四年黃遠庸致章士釗書（原載甲寅第一卷），主張新文學有提倡的必要。民國五年十月，胡適之致陳獨秀書說：『綜觀文學墮落之因，蓋可以「文勝質」一語包之。文勝質者，有形式而無精神，貌似而神虧之謂也。欲救此文勝質之弊，當注重言中之意，文中之質，軀殼內之精神。』民國六年一月一日，新青年雜誌發表胡適之之文學改良芻議及陳獨秀文學革命論。胡陳諸先生在倡導文學革命的時期並沒有用「文藝復興」的字樣，可見他們的主張是切實而具體，並不願意有所鋪張或附會。

文學改良芻議中說：『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即以文論，有尚書之文，有先秦諸子之文，有司馬遷班固之文，有韓柳歐蘇之文，有語錄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比文之進化也。試更以韻文言之，擊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時期也；三百篇之詩，一時期也；屈

原荀卿之騷賦，一時期也；蘇李之下，至於魏晉，又一時期也；江左之詩流爲排比，至唐而律詩大成，此又一時期也；老杜香山之「寫實」諸詩（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樂府），又一時期也；詩至唐而極盛，自此以後，詞曲代興，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詞之一時代也；蘇柳（永）辛姜之詞，又一時代也；至於元之雜劇傳奇，則又一時代矣；凡此諸時代，各因時勢風會而變，各有其特長，吾輩以歷史進化之眼光觀之，決不可謂古人之文學皆勝於今日也。』

適之先生在二十年前曾同我說起，他發起「文學改良」的時候還不夠「革命」，他到底還借重了歷史進化的眼光，引用了許多演變的事實，以證明「文學革命」的必然與自然。「後來居上」有時也不盡然，還得看努力的方向和創造的成果。三十年以後來檢討當時的主張，我們應當注意發起人的環境與心理。一切革命運動都有同樣的現象。他們一方面充滿了勇氣和樂觀，一方面盡量借重一切的理由和力量。例如文學改良芻議說：『以今世眼光觀之，則中國文學當以元代爲最盛，可傳世不朽之作，當以元代爲最多，此可無疑也。當是時，中國之文學最近言文合一，白話幾成文學之語言矣。』當然在提倡白話運動的時候，以

白話名作爲最優最多最好，乃爲必然的要求。「歷史進化」說，在文學批評上大可討論，古典主義同浪漫主義的爭，亦着重於此。若是後來的一定無條件的好，三十年前便會主張：「吾每謂今日之文學，其足與世界『第一流』文學比較而無愧色者，獨有白話小說（我佛山人，南亭亭長，洪都百練生三人而已）一項。」試問現在青年還推恨海九命奇冤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嗎？以這些作品與水滸西遊記三國紅樓夢儒林外史比較，是否「後來居上」呢？

「文學革命」已經有出乎意外的成功，當時的論點大部份很對很好，也有小部份因爲當時過度熱心的辯護而需要後來修正或刪改。民國七年，胡先生發表建設的文學的革命論，以消滅的「八不主義」改爲積極的四項主張：一、要有話說，方纔說話。二、有什麼話，說甚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甚麼時代的話。這四大主張，爲着建設「真文學」和「活文學」，以代替「假文學」和「死文學」。他希望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個個都該從建設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內替中國創造出一派新中國的活文學。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中，胡先生曾經指出：「一言以蔽之，曰：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此時代與彼時代之間，雖皆有承先啓後之關係，而決不容完全鈔

襲；其完全鈔襲者，決不成爲眞文學。愚惟深信此理，故以爲古人已遊古人之文學，今人當造今人之文學。至於今日之文學與今後之文學究爲何物，則全係於吾輩之眼光識力與筆力而非一二人所能逆料也。』

「但開風氣不爲師」，是何等謙虛的態度。嘗試集只是文學革命倡導者的創作的「嘗試」。白話文學史引子說得好：『故一千多年的白話文學播下了近今文學革命的種子；近年的文學革命不過是給一段長歷史作一個小結束；從此以後，中國文學永永脫離了盲目的自然演化的老路，走上了有意的創作的新路了。』

盲目的自然演化是可怕的老路，因爲盲目，不一定便能產生偉大的時代作品。有意的嘗試創作是光明的新路，因爲有意，我們便會共同努力去追求眞美善的創造精神。文學革命是文藝復興的前驅，乃是毫無疑問的。爲着討論的方便，我們應當分別「文學革命」與「文藝復興」。以時間論，文學革命在前，文藝復興在後，沒有文學革命，便不易有文藝復興。以內容論，文學是文藝的部份，文藝包括文學與藝術。革命是復興的前驅；革命的工作，破壞重於建設；復興的工作，建設重於破壞。破壞以後便於建設，革命以後必須復興。我們可以

引伸文學革命的理論到文藝創造的理論：我們必須建立「活文藝」和「真文藝」。一民族有一民族的文藝；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藝。此民族與彼民族之間，雖可有文化交流的影響，但決不容完全模仿；此時代與彼時代之間，雖皆有承先啓後的關係，但決不容完全鈔襲；其完全模仿者，決不成爲活文藝；其完全鈔襲者，決不成爲真文藝。

我們試參考西洋文藝復興的意義。根據一種定義，文藝復興是古代文化的再生，尤其是古代思想方式，人生方式，藝術方式的再生。在歐洲所謂古代文化，主要的是指希臘。西歷一二〇四年，君士但丁堡爲十字軍佔領，西方學者始得窺希臘的寶藏。後來詩人但丁和小說家布喀修都熱心提倡希臘文學。一四五三年君士但丁堡陷落，許多古典學者逃往義大利，義大利成了近代文藝復興的大本營。在十八世紀後半，古典雕刻，古典藝術史，古典藝術理論，都經學者重新整理出來。到十九世紀前半，古典建築亦經發掘。文藝復興運動主要的收穫，是探知了希臘古典文化之最內在、最永久的部分。這就是人性之調和，自然與理性之合而爲一，精神與肉體之應當並重，善即在美之中，人格必須完美等等。總起來說，就是人文主義(Humanism)——健康、和諧、完美、充實。

或者有人說西洋文藝復興的真意義，乃在新世界與新人類的覺醒。新世界的覺醒須有新天文學的發現，哥白尼、凱卜勒實開其端。新人類的覺醒，乃基於新的形上學或對於人生問題有深厚的情感——有光，有熱，有深度，有遠見，有自覺，有共信。我以為這兩種意義，只是一個運動的兩方面。文藝復興，需要重新發現創造的文化根源，亦需要共同建立健全的時代精神。重新發現文化的根源，是遍於古典的，但決不是模仿陳腐的固有形式，而是發現創造的文化活力。共同建立時代的精神，是偏於現實的；但決不是鈔襲皮相的外來影響，而是建立健全的時代覺醒。

文藝復興需要新的文化活力和新的時代精神。文化是有歷史淵源的，所以要從民族文化探求創造的活力，以充實新文化活力。時代是受地理影響的，所以要從世界文化吸取健全的精神，以建立新的時代精神。簡單說，中國的文藝復興需要創造的文化活力和健全的時代精神。根據這兩大原則，我將大膽的對於縱的文化根源方面和橫的文化交流方面而加以檢討，並且對於舊文藝的認識和新文藝的創造貢獻意見。

二 文化根源與創造活力

在民國十年編印的英文中國文化論文集中，丁在君先生首先說明「中國怎樣得到文化」。他堅決否認西洋商人或教士對中國文化的誤解——誤解中國文化在數千年來已發達到最高峯，以後只有墮落或停頓。有些西洋人以爲中國文化只同古埃及或梅蘇坡坦密亞（Mesopotamia）一樣，但還沒有完全死去。例如格蘭納（Professor Granet）所著中國文化（La Civilisation Chincise），無意中就以公元前八七年爲中國文化發展的終點。丁先生根據安陽發掘的考古報告，指出殷商文化與周文化的不同。他從許多方面證明中國文化有持續的發展，並不像外人所認爲的保守不變。四千年來，我國文化不斷受外來的影響，但這些影響，每經過中國化（Sinianised），而不易從表面認出來。根據顧頡剛著古史辨，許多傳說的皇帝，始見於公元前四世紀的著作。書經關於夏朝的可靠部份，大約寫在公元前四世紀以後。從梁啓超、王國維、及傅斯年等對於商頤周頤的論著裏，書經及詩經關於商朝的部份，大約作於公元前七七〇年以後。但從安陽發掘的甲骨文，王國維著殷卜辭所見先公先王考，證明史記所載商朝的

帝王系不差。我們雖不能從此就證明史記所載夏朝的帝王系一樣的正確，但丁先生根據秦統一天下以前諸夏的統稱，認為夏朝確實存在，就像後來以漢族代表中原的中國人一樣。從中國的古銅器中，找不出夏朝的出品，可見銅器時代始於商，而夏朝還在仰韶時期。這樣說來，中國的銅器時代，約始於公元前一七〇〇年，比蘇慕里（*Sumeria*），或埃及約晚二千年。丁先生的第一個結論是：中國的文化發展比較晚。他的第二個結論是：中國文化的發展，是逐漸而且連續的。他提到中國古代的天文學。殷商時期，一年有十二個月，每個月大約三十日，分上中下三旬。每個月大概從月初見時算起。這點與埃及或梅蘇坡坦密亞相同，但與印度不同。周初以一個月分為四週。但在公元前八世紀時，每個月的開始，改在月初見的前兩天，即日與月相對照之時。此月初名為「朔」。詩經中所詠之「日蝕」，推算起來，當在公元前七三五年之十一月二十二日，即十月朔。春秋初期（公元前七二二—五九五）。計年自第十一月算起，閏月加在年後。公元前五九五年以後，計年改自第十月算起，即自冬至開始。十九年中七閏，亦較前進步。

大凡一個民族能觀察日月星辰至相當正確程度，其文化亦必已有相當發展。抗戰時期，

中央研究院的董作賓先生完成一部艱巨的著作——殷曆譜。他從甲骨文的記載和天文學的推算，證明中國的歷史，從商湯元年庚戌（公元前一七五一年）到現在，有三六九八年可靠而不斷的記載。他主要的根據，是公元前一一三七年甲子日全食的絕對定點（殷帝辛三十八年正月己亥，即周文王三十五祀的日全食），和公元前一一六四年丁酉（帝辛十一年正月丁酉），一一四九年壬子（帝辛二十六年正月庚子），及一一二一年庚辰（武王元祀殷二月丙辰）三個「朔」日的相對定點。他曾指出：自武丁二十九年十二月庚申月食爲定點至民國元年一月一日丙子，歷三千二百二十二年，爲世界最長久的紀日法。新的天文學應用到考古學，近四千年延續的文化，方始得到了科學的證實。

殷商的歷史既然確實可考，那麼夏朝的歷史可能性便很大了。由此而推。夏禹治水，亦不見得完全不可靠了。我國以農立國，水利最爲重要。夏禹治水的傳說，也許就是代表許多先民對於農田水利的集體貢獻。中華民族在夏朝的時候已經早從游牧生活，進到耕種生活，也可從這個傳說而推論。秦太守李冰父子，在四川灌縣鑿離堆，築都江堰。這個水利工程，現在不但還保存着，並且經過每年修治，繼續有利於人民。蜀人爲紀念李氏父子，尊爲川

主，並築二王廟。廟成，便有人建議以李冰的誕辰爲廟會之期。但是，李冰是一位太守，他從來不做生口，誰能知道他的誕辰呢？後來蜀人即以相傳的大禹的生日爲李冰的生日，那就是六月初六日。（中國工程師學會以六月六日爲工程師節，即是表示推崇大禹的意思）。古書上另有一種傳說，禹死爲社神。我走過貴州的時候，發現土地廟前的紅對聯，說六月初六是土地生日。後來打聽，苗山僑山的同胞都供土地，而以三月初三，六月初六，同九月初九爲祭神歡會之期。水利的發達同文化的進展大有關係。從都江堰及關中八渠等可以推知秦漢以前農田水利就很發達。戰前我曾遊太原，訪晉祠。難老泉的水，流了幾千年，還在灌溉着無數的農田。我們先民的宗教信仰，只求神賜的農田的水利和嬰兒的健康，晉祠現在還供着水神，而這水神兼管保育嬰兒的任務。「有功於民則祀之」，大禹以至李冰，以至近代的李儀祉，自然會受人民的崇拜。關於宗教與哲學，中國文化論文集中，胡適之先生另有專文，可供參考。胡先生以中國思想史分爲三個時期：第一時期爲「中國教」時期（Sinitic age），自古代至第四世紀。第二時期爲「佛教」時期，自公元三百年至一千一百年。第三時期爲「文藝復興」時期，自十一世紀的「新孔學」至今。中國古代文化是商周的混合，「中國教」是